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



蒙古族民间故事选

MENGGUZU MINJIAN GUSHIXUAN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

蒙古族民间故事选

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钱舜娟

装 帧：何礼蔚

插 图：吴克柔

蒙古族民间故事选

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10 字数 258,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1—120,000册

书号：10078·1880 定价：1.25元

前 言

蒙古族民间故事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的一宗丰富多采的遗产。它以活的艺术语言记录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阶级感情、思想倾向和传统的民族习俗，表达了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蒙古族民间故事包括传统故事、讽刺抨击僧俗统治阶级的故事组——巴拉根仓和沙格德尔的故事等。其中尤以传统故事数量浩瀚，内容丰富，涉猎的生活面极为广阔，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蒙古族人民与自然的斗争和社会斗争。

在传统故事里，有许多征服自然的故事。这些故事充分展现了猎人和牧民面对大自然的肆虐，敢于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这里有砍火龙、斩巨蟒、肩扛两座大山、追射十一个太阳的神话式英雄；也有与狼群搏斗、和虎豹撕拚的大无畏勇士；他们战洪水、救乡亲，不惜献出生命；解干旱、夺水源，敢和蟒魔抗争。这些故事展示了一幅幅向大自然搏斗的壮丽图景，集中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能征服一切的伟大抱负和力量。生活在沙漠和高山林海地区的人们多么渴望改变这恶劣的环

境：于是杀死黄风怪，让美丽的仙毯化为绿水青山、牛羊成群的瑰丽景色，渴望改变山高苦日短的阴沉天气，驱散乌云，让金色的阳光普照大地，便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沙丘国》、《宝钥匙》）。这些力图改变现状的故事，深刻揭示了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来向自然界的狼虫虎豹、风雪雾瘴、旱涝疫病作斗争的生活历程。更可贵的是劳动人民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不只是客观地叙述斗争的始末，而是通过人物之间或人物与邪恶势力之间的矛盾来充分表达他们的是非爱憎及其美学理想。

首先，口头创作者以编织民间故事的独特手法，塑造了众多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英雄形象。如猎人海力布为了使群众免于水患，将发天水的秘密告诉了乡亲而自己却英勇献身，变成了山石（《猎人海力布》）。更可钦羡的是这些英雄虽然为人民牺牲了，变成了自然万物，可他们的身躯还要献福于人类，有的长出药草为穷人治病（《半拉山的故事》）；有的继续保护着人们的生命安全。民间故事家总是以惊人的想象、全部的热情来塑造这些英雄，讴歌他们光采照人的崇高品德。而且有不少故事通过不同人物行为的对比，一方面赞美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忠诚善良、光明磊落的光辉品质；一方面鞭挞那些目光短浅、浑噩庸碌之辈，以及懒惰贪心、自私自利的丑恶言行。更值得回味的是劳动人民对某些形象表现得十分得体，恰如其分。如在《天上人间》这篇故事中，民间故事家描述了三个形象：天神、地神和阿拉特。天神、地神要巡游人间，体察民情，惩办恶人，当然跟那些残暴的统治者不能相

提并论。但是，天神以偏概全，全凭主观感情办事；地神从个人恩怨出发，只能对某一个对他有好处的人施点恩惠。地神虽比天神略高一筹，但与阿拉特那种处处为群众着想的献身精神相比，显得何等渺小！这里虽未将天神、地神推向统治者一边，而在对阿拉特舍己为人的赞美中，也批判了天神、地神的不公平、狭隘自私和莽撞。所谓“天公”并不公，“天理”哪有理！因此，细加琢磨，发人深思。劳动人民对各种人物的褒贬爱憎，态度明朗，界限分明。从这里可以看出，蒙古族人民在讲述故事时，为什么总是精心塑造正面英雄形象，让这些人物在尖锐的矛盾中受到考验，主要是为了突出他们优美的道德品质，表现出他们的力量和智慧，让千百万压在最低层的劳动者受到教育，得到鼓舞。

千百年来，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在痛苦中挣扎，过不上幸福的生活，而那些利欲熏心、残酷暴戾的可汗、王爷、诺颜、牧主却一个个骄奢淫逸，脑满肠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逼得人民不得不起来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展开斗争。这些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在蒙古族民间故事里得到了生动的概括和描绘。这类作品反映的压迫剥削罪行是怵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小奴隶透露了他要对王爷报杀父之仇，立刻被扔进深井，斩草除根（《乌兰巴托尔的故事》）；一个摔跤手因为连连战胜了乌珠穆沁王的摔跤手而丢了王爷的丑，竟被逼和嗜杀成性的牦牛去搏斗，乌珠穆沁王几次戕害他未成，最后竟派人把他枪杀（《巴林摔跤手》）；王爷看中了穷苦牧民的姑娘索拉，命奴仆抢走了她，纵恶狗咬死她的情人牧儿，索拉绝食，饮恨死去

(《不死山》);巴林王和梅林为了开心取乐,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中拿儿童的身躯和头颅当箭靶,把他活活射死,把一个“那达慕”大会变成了鲜血横流的屠宰场(《怒杀巴林王》)!这许许多多令人肝胆俱裂的描绘,深刻揭露了保留浓厚奴隶制残余的封建领主占有制的野蛮和残暴。

有压迫就有反抗,富有斗争传统的蒙古族人民毫不屈服,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无论是现实性较强的篇章还是神话色彩较浓的幻想之作都表现了蒙古族人民顽强的斗争精神,显示了他们能战胜一切恶势力的巨大力量和智慧。故事中的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就是这种力量 and 智慧的化身。乌兰巴托尔被扔进深井以后,在三名有奇术的奴隶和神马的帮助下得以不死,他们联合起来对王爷展开激烈的斗争,终于实现了报仇雪恨的心愿;索拉、牧儿虽然惨死,但死后还要变成两座拥抱在一起的复仇山峰,把王爷从山峰上摔下河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乌龟。这些故事中,不仅有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劳动人民力量的篇章,还有描写现实生活中奴隶起义的颂歌。巴林王射杀儿童的罪行点燃了牧民们反抗的怒火,一场急风暴雨的起义斗争之后,王爷被杀,罪恶的王府也付之一炬!象这类波澜壮阔的斗争史实,能在民间故事里得到生动的描述,充分证明了民间文学是被压迫人民世界观的重要反映。

蒙古族民间故事里,除了有体现人民巨大力量的英雄,还有智慧象星星一样多的姑娘、巧媳妇。她们聪明非凡,智慧过人。一个极普通的媳妇可以使老天爷也奈何她不得。她们

对爱情忠诚，能帮助丈夫克服困难，战胜统治者的迫害。安庆夫美丽的妻子被王爷看中，王爷千方百计刁难，妄图将她霸占，结果都被他们巧妙地一一击败，使王爷的阴谋彻底破产（《机智的猎人》）。一个可汗为自己的傻儿子选聪明的妻子，他考查了所有王公贵族、富人的女儿，并无一个称心，可是一个老牧工的女儿却能应付裕如地解答各种各样难题而被选中。她辅政以后，很快将汗国治理得强盛起来，制止了另一汗国的侵略（《奥塔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闪烁着机智和讽刺光芒的短小精品，确实脍炙人口，爽心悦目。《腊梅花和“索胡尔李”》以诙谐的诗歌语言，淋漓痛快地揭露了宗教迷信的虚假。

那些讽刺笑话，把一件小事随手拈来，三言两语，无不风趣，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大多具有鲜明的思想内容和一定的社会意义。如《没有生胡子的巴彦》、《财迷虫》、《一枚铜币》等，对那些诺颜、巴彦、大喇嘛的怪吝刻薄、贪婪愚蠢的丑恶行径揭露得极为深刻，入木三分。这些讽刺笑话生动地证明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一真理。劳动人民不仅凭英勇与统治者作战，也用才智和谋略挫败敌人。他们或者设下圈套，“请君入瓮”；或者唇枪舌剑，一针见血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隐私。对统治者翻肠倒肚，极尽嘲弄，使他们劣迹昭著，大出丑相。这些机智能干的人物同情弱者，总是为穷苦人抱打不平，伸张正义。所以有的连为所欲为的统治者也惧怕他们三分，不敢招惹。

蒙古族在参与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同时，积累了丰富

的生活斗争经验，许多故事告诉了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花甲老人》通过三桩事情的解决，说明老人生活斗争经验之丰富。一个社会不能没有老人，国家要强盛，社会要延续下去，就得不断从老一辈那里吸取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智慧鸟》却是通过三个饶有趣味的故事，讲明了一个生活真理：不能粗心大意，凭一知半解的表面现象去解决问题，不然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光有良好的心愿而没有对待事物的正确方法，仍然会把事情办得一团糟。象这些包含着朴素辩证思想的经验之谈，正是劳动人民经过无数体验，甚至是血的教训才总结出来的。

蒙古族民间故事不仅思想上能给人以启示，艺术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那粗犷质朴而明朗的基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独特的形象表现和叙述方法，简练动人的语言风格，无不引人入胜，具有夺人的艺术魅力。

故事在形象塑造上，特别是神奇故事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大都受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传统影响。这些英雄剽悍粗犷，勇敢朴爽，他们力大无比，“一巴掌能打倒一头犍牛”，“摆弄一匹马就象摆弄一只兔子一样”。甚至极力夸张，“孩子生下来不是一天一天长大，而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往上长，不到一天，就长得比成人还高了。”如此等等，这种比喻和描绘，多么象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可汗》的韵味。这些英雄仗义勇为，有坚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利诱动心，总是一心一意为群众。他们有精湛的骑术，绝伦的箭法，高超的摔跤技艺，这又和英雄史诗中举行好汉的三种比赛

一样，都是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他们叱咤风云，大气磅礴，山压下来能扛，虎背上敢骑，敢摘下魔王头上的帽子，能把虎王一拳打进地层。这些具有蒙古民族特性的英雄形象通过独具特色的叙述和描绘，显得特别朴实健美，亲切动人。

素有歌海之称的蒙古民族，在讲述一个故事时，常常离不开那娓娓动听的诗歌语言。当枣红马夺得冠军荣誉时，草原上响起了赞马的歌声。通观《枣红马》全篇，不正是一首优美的赞诗？！它赞美了草原上的金龙，又歌颂了那识别金龙的“伯乐”——驯马的女主人。这种散文中结合美丽诗句的表现形式，是善于歌咏的民族描绘事物、表达感情的特殊表现手法。加上在叙述时用了大量生动的比喻、谚语、格言，使故事具有炽热的气氛，更加散发着浓烈的草原气息。

蒙古族人民有丰富的想象力，幻想驰骋，几乎成为故事的主要成份。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到多么奇妙的幻想，大胆的构思。这种丰富的幻想构成了蒙古族传统故事的主要艺术特征。在故事里，沙漠可以变绿洲，湖水能够成平地；能叫大山让路，能到海底遨游；天上仙境，地下王国，出入无阻，来去畅通。在这种幻想下，老人变为年轻，人死又能复生。一面镜子既能幻化成明晃晃、亮晶晶的水晶宫，又能变成浪涛滚滚的汪洋大海，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在这种幻想下，鸟兽可以和人一起生活，同故事的主人公一起斗争，帮助主人公克服困难，帮助主人公战胜敌人。

更值得提出的是：马的故事特别丰富，十分精彩。马是蒙古族人民生产的工具，生活的伴侣，是猎、牧民重要的生产生

活资料。蒙古谚语说：“牧人有了马，象鱼儿有了水”，可见马的重要地位。马不仅成为许多故事的重要情节，而且还有丰富多采的专章。《枣红马》赞美神速的骏马，颂扬那别具慧眼的识马人；《马头琴》通过讲述马头琴不平凡的来历，诉说小白马和他主人的悲惨命运；《云青马》和《黄骠马的故事》则又是一曲反迫害、争自由的高昂战歌。至于《金马驹》中的金马驹，它不是一匹寻常的骏马，它是具有活力、埋葬在祖国地下的宝藏，帝国主义分子想要盗走它，结果金马驹奋起反抗，使掠夺者葬身湖底。这正是劳动人民通过拟人化的幻想形式来赞美祖国的地下宝藏，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

蒙古族人民在长期放牧、狩猎的生产斗争中，还创造了丰富的动物寓言故事。这些故事通过人格化的动物，曲折地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感情。这些故事的主题鲜明，寓意深刻。如《狼和羊羔》这篇作品，就以生动的情节揭示了世界上一切压迫剥削者的强盗逻辑：你弱，你就理屈；我强，我就是公理。用狼对羊羔的话说，就是：“你的父亲都做过些什么坏事，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光知道：你是很肥美，很可口的。这也就是你的坏处吧。所以，我要吃你！”象这类短小活泼、辛辣尖刻的作品，对于今天的读者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不仅如此，人们还通过幻想的形式，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关于地方风物的传说故事便是民间故事家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追述某个地方的来历中，一方面赞美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英雄业绩，一方面反映现实的阶级压迫、阶级斗争。也有

对自然风光本身富有诗意的颂歌。如《白银蛇河》就是借一条蜿蜒在大青山麓银白如带的河流，幻想出一尊献福于人类的圣洁女神——白银蛇。

总之，蒙古族人民凭藉丰富的幻想给我们创作了许多晶莹夺目、光彩绚丽的好故事。这些故事“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之光”（高尔基《谈故事》）。当然，这些丰富的幻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幻想，而是用他所接近和熟悉的事物来表达对于幻想世界的理解。比如猎人为了不遭危险地猎获野兽，希望能从各种飞禽的行为中辨认野兽的行踪，因而产生了如何能懂得各种鸟语的幻想。牧民为了很容易地找到放牧的牲畜，又产生了如何变成千里眼的幻想。《黄骠马的故事》中的百合其其格遭到王爷的迫害，谁来救她呢？只能是从小放牧骑乘的黄骠马。治死王府军队的宝物，也只有她身边常用的梳子、篦子、镜子之类的东西，除此还有什么呢？再也没有了。所以民间故事家幻想的翅膀虽然可以出入天地，但不能超出广义的生活范围。他所依据的现实以及运用的创作素材，也正是构成民间故事具有本民族特有风格的重要因素。

由于劳动人民对实际生活中的饥饿贫困感到极端不满，总希望通过“另一个世界”的美满幸福、劳动和快乐来安慰自己的心灵，鼓舞人的斗志。然而这些古代人们的愿望和理想不得不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故事中，我们往往可以发现这样的情节：一个残暴的可汗或国王被某一英雄治死后，那位英雄当上了国王，他的妻子当上了皇后，然后过起美满的生

活。或者是一个可汗由于一件事的教训使自己认识了错误，纠正了错误，因而国家强盛起来，人民得到安乐。这实际是一种“皇权思想”的反映，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皇帝来代替暴君，在英明君主的治下过幸福生活。这种认识论的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剥削制度这一祸害的总根源，所以他们这种向往，也只能是甜蜜的空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

另外，在这类民间故事中，除了民主性的精华外，还有一部分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和宗教迷信的故事、低级庸俗的色情故事，这正是两种文化在民间故事中的反映。例如宗教故事《哈巴狗、小猫、老鼠》、《乌鸦和喜鹊对话》、《绵羊、山羊、牛的对话》等，除了吹捧大喇嘛为“造福于众生的救世主”外，还宣扬了佛教的爱生论，这显然是佛教徒和封建统治者所杜撰，毫无可取之处。就是在一部分比较优秀的故事中，也有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而在某些情节上沾染了宿命论及宗教迷信的灰尘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阅读这些作品。

关于巴拉根仓和沙格德尔的故事，是蒙古族人民长期以来围绕这两个人物、着眼于现实生活的一些侧面创作而成的故事。它与上述故事的风格有明显的区别，可自成一体。

巴拉根仓的故事是蒙古族民间讽刺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人民的集体创作。由于它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广泛流传，不断产生新的作品，所以便自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故事组。

主人公巴拉根仓是个机智、幽默、风趣横生的人物，富有鲜明的阶级感情。他敢于同各类僧俗统治者（包括王爷、诺颜、财主、喇嘛等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他们的残暴、骄横、

贪财、吝啬和宗教的伪善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捉弄和挖苦，使他们难堪、胆寒，以至于丧命。他对于贫苦人民却寄予深厚的同情，想尽办法帮助他们，替他们报仇出气。因此，巴拉根仓在不同阶级的人们当中，就有了迥然不同的评价：王公诺颜们给他加上了“说谎者”、“骗子手”等种种恶名；穷苦牧民则称赞他是神通广大的“智者”，说“风能刮到的地方，人们都知道巴拉根仓的名字。巴拉根仓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哪里就有许多朋友。”可见，这是个群众基础十分深厚的民间艺术形象，关于他的故事至今还是蒙古族人民喜闻乐道的口碑文学之一。

巴拉根仓的故事中也有些趣味不高、庸俗无聊的作品。如描写主人公对财主的女儿一见钟情，想出种种荒唐的办法去高攀这门亲事；对农牧民的一些生理缺陷加以嘲笑，等等。这说明巴拉根仓这一形象的阶级性有时还是很模糊的。他同各类统治者的斗争，在某些场合也仅限于取闹和恶作剧，没有去揭露他们的本质，这样就不免降低了作品的思想意义。此外，有的作品还故意编造主人公的家谱，对他进行诽谤和侮辱。这说明巴拉根仓的故事刺中了统治者的要害，所以他們要极力歪曲篡改它，企图磨灭它的斗争锋芒。

沙格德尔的故事是劳动人民根据沙格德尔的斗争生活和他的即兴诗章编织而成的口头文学，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沙格德尔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蒙古族民间诗人。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伸进东北，封建军阀和民族内部的王公贵族互相勾结，对蒙古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压榨，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沙格德

尔由于受僧俗封建统治者的迫害以及现实生活对他的启示，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逐渐走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他以真实深切的感受，创作了许多抨击黑暗社会的讽刺谴责诗。

沙格德尔的诗和故事从许多方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勇于打抱不平；对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罪行及其贪婪无耻的本质，敢于面对面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对活佛喇嘛们的腐败堕落以及宗教的虚伪性也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这些疾恶如仇的言行，激怒了王公、总管和掌权喇嘛们，他们对他进行了种种惩罚和恶毒的人身攻击。但是，沙格德尔毫不屈服，愈斗愈勇，对那些骄横无耻之徒，百般嘲弄，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地发出了战斗的呼声。

沙格德尔的谴责诗是面对现实的口头即兴创作，大部分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民主精神。这些以诗歌为主体编织起来的故事，热情奔放，形象生动鲜明，使故事能更好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沙格德尔是黑暗时代草原上一个自发的反抗者，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找不到明确的斗争方向，但是他那种满含阶级仇恨、无所畏惧的反抗精神，就是在今天也令人鼓舞。他的诗歌和故事在广大人民中有广泛深刻的影响，是蒙古族宝贵的民间文学遗产。

蒙古族民间故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又丰富发展了这一特色。随着民族间接触的频繁，蒙古族人民与汉、藏人民有了密切的联系，

所以一些汉族和藏族的故事传入蒙古地区。如汉族的传统故事《孟姜女》、《樵夫的故事》；藏族的动物寓言故事《猫和老鼠》、《乌龟和猴子》、《骄傲的白象》以及《三十二个木偶的故事》等等，都在蒙古族地区长期流传演变。蒙古族人民根据自己生活的特点，对某些故事进行不同程度的取舍改编，使之变成了蒙古族民间故事的一部分。这种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使蒙古族民间故事也吸取了有益的滋养，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学宝库。

这本《蒙古族民间故事选》大都是传统作品，根据故事的不同类型，分成五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流传的起义斗争故事和革命故事（如席尼喇嘛故事、抗日故事等），特别是建国后产生的新故事传说，俟搜集整理后，另出专集，故未收入。

这本故事选收入的作品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自治区内外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搜集、整理、翻译的，也有零星发表在报刊上的。这些故事大都在民间广泛流传，有原始记录，是蒙古族口头文学的宝贵资料。但是，有的故事由于是建国初期搜集的，那时经验不足，讲述人、产生年代及变异情况没有详细记录，并加以探索，因此，还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同时，为了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考虑到某些故事的完整性，有必要从思想和艺术上对原始记录进行不同程度的整理加工。因此，这个集子中有的作品不宜当作第一手的科学资料加以利用，只可供研究者参考。

这次编选，在一九六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民间故事集》的基础上，增选了各类故事四十三篇，力求反映

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概貌。但是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全，水平有限，恐难以尽如人意，存在的缺点或错误，请广大读者批评。

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
文 学 研 究 室

赵 永 铤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